

琉球及東南諸海島
與中國

梁嘉彬著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三月東海大學初版

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

梁 嘉 彬 著

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

Island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Emphasizing the Ryukyus,

Liang Chia-pin

版權所請翻
印勿有權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三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新臺幣：肆拾元 平裝
美金：壹元五角

新臺幣：陸拾元 精裝
美金：壹元五角

著者：梁 嘉 彬

出版者：私立東海大學

臺灣省臺中市大度山

經售者：中央書局

臺中市中正路一二五號

正中書局

臺北市衡陽路二〇號

印刷者：廣益印書局

臺中市中正路九九號

Island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s,
Emphasizing the Ryukyus,

by
Liang Chia-pin

本
書
係
由
美
國
哈
佛
燕
京
學
社
資
助
印
行
特
此
誌
謝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has been made possible through
a generous grant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

梁 嘉 彬 著

壹 中國海洋發展及與琉球有關諸問題

論我國指南針指南車發明與方士入海	一
從韓國「明刀」出土看東漢以前中韓交通	一九
日本是怎樣開國了的？	二九

關於徐福史料之觀察	三七
-----------	----

魏志倭儒國（琉球）裸國（臺灣）黑齒國（菲律賓）考	六一
--------------------------	----

關於華人發現美洲的觀察	七三
-------------	----

唐施肩吾事蹟及其「島夷行」詩考證	七九
------------------	----

明代以前中菲關係小考	一〇一
------------	-----

貳 琉球史地叢考及其與中國關係之論證

流求史論正謬	一〇七
--------	-----

古琉球確即瀛州考釋	一六一
-----------	-----

三國時代夷州亶州考 一八一

三國時孫權所伐夷州確為琉球而非臺灣之證據 一九一

流求辨 一九九

從純學術立場論隋書流求答臺灣論者 二〇七

論「隋書流求為臺灣說」的虛構過程及其影響 二一九

——兼論東吳夷州為琉球——

論隋書「流求」與琉球臺灣菲律賓諸島之發見 二六五

論隋書「流求」與臺灣琉球日本海行記錄 二九三

宋代「毗舍耶國」確在臺灣非在菲律賓考 三二三

「琉球舜天王為日人血胤說」正謬 三三七

琉球古今見聞考實 三四五

壹、中國海洋發展及與琉球有關諸問題

論我國指南針指南車發明與方士入海

一、指南針指南車同是發明於陰陽方士

指南針和指南車同是中國所發明，此為世界的公論。但因世人忽略了這兩種工具同是創作於我國精研黃老之學陰陽之術的方士之手，故其發明史至今晦而不彰。

1. 指南針是發明於方術之士：

指南針是發明於陰陽家（方家），明見於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和南宋程棨三柳軒雜識（元陶宗儀編說郛卷二十一有載），我們考驗沈括程棨的記錄是否準確，應先追究周漢間陰陽家的著作和接近陰陽家的學者的著作。我追究到鬼谷子（這書經我考證，認為實即漢書藝文志裡所錄陰陽家鬼容區三篇，其著作年代最晚應不遲於戰國時代，詳拙著鬼谷子考，載大陸雜誌十卷四期），追究到關尹子（關尹子與鬼谷子的關係亦見拙著鬼谷子考），追究到韓非子、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淮南萬畢術、春秋繁露、論衡、抱朴子，和史記封禪書、日者列傳、扁鵲倉公列傳、漢書郊祀志藝文志以及山海經等書，看出指南針確實是發明於陰陽方士，且其發明不會過晚。幾年以前，有一位研究指南針的專家王振鐸先生來到臺灣，我曾有機會向他請教，他很同意指南針發明不致太遲的論點，以為商殷的國都全是靠近磁石和鐵出產的地方（今河北省磁縣，本草綱目明記磁石以磁縣所產者為最良，又其鄰近即為產鐵

區)，而商代的方位學從發掘所得看來又都已極準確（可參考張蔭麟著中國史綱），故說磁針發明最早推在商代亦不為過。我更以為商代是一個最注重陰陽五行和水陸交通的朝代，假如磁針的發明最早可推在商代，則其發明最早恐是由於堪輿術上的需要，其次是登山入海的需要。在鬼谷子上卷反應篇裡有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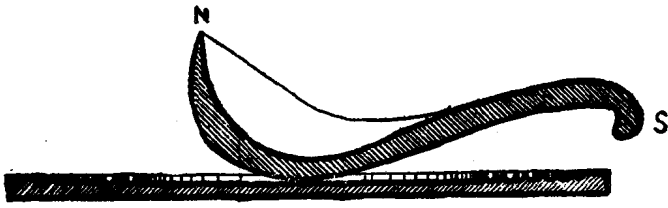
「磁石之取鍼（針）。……」
在中卷謀篇裡有說：

「……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量量能愜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鬼谷子因要舉例闡明其教義，無意中透露了最少在春秋的鄭國已有「司南之車」。玉是生在山裡的，這「司南之車」，分明是由於登山而載。在藝文類聚、文選注、宋書禮志、太平御覽各書內俱有引鬼谷子此語。藝文類聚在「載」字上增入「必」字，宋書禮志在「司南」之下省去「之車」二字，我以為鬼谷子所說，無論是「司南針」也罷，是「司南車」也罷，那種利器是必藉磁針爲用的。我們比較閱讀東漢王充的論衡，便可明白。論衡卷十六亂龍篇云：

「頓牟（琥珀）掇芥，磁石引針。」
其卷十七是應篇云：

「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我以為在春秋當時，我國的機械學恐難發展到藉機械輪齒來定子午的地步，是必仍藉磁針。鬼谷子和論衡在同一書裡竟然會一面提到磁石（磁石）引鍼（針），一面提到司南定向。是當非偶合，其引喻自必同由磁針一物取來。再者，鄭國是鄰近磁石和鐵的產區，鬼谷先生和王充都是和入海方士有關的人物，這更暗示了「司南」的入海使用。我們再看關尹子六匕篇，有說：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杉案：謂龜卜也）；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



——盤經羅與車南指南司：鐸振王自採——

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

看出關尹子的舉例之三的枯龜、鐘鼓和舟車都是各有實際用途的工具，其所舉磁石之例自然也必從當時的應用工具裡取來。參照淮南子「磁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又淮南萬畢術佚文：「磁石提棊」、「磁石拒棊」便可明白。再看韓非子有度篇：

「夫人臣之侵人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再看呂氏春秋季秋紀精通篇：

「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附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

更可看出君主主要是要正南面而立以肅綱紀的，因此用磁針或天然磁石製成的「司南」這個工具的應運而生，最遲也不會遲於周代的先王。

關於東漢王充論衡是應篇所說「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的解釋，據王振鐸先生說，大意是：「司南這個勺形的東西（杓），投轉在地（地盤），停止時其尖端終於指向南方。」王氏並製有司南勺和地盤的模型，插圖如上。

我們除了在陰陽家或接近陰陽家的學者的著作裡偶爾尋到「司南」（指南針）的引喻以外，在儒家或一般讀書人的著作裡便看不到「司南」的記錄，這又證明了「司南」一物確是發明於方術之士。

2. 指南車也是發明於方術之士

我所以確定指南車也是發明於方術之士，是有下面兩點理由：

(一) 記載指南車的起源最覺簡括而且最可藉以看出是必為陰陽家發明者，厥為南宋高承所撰事物紀原。其卷二輿駕羽衛部云：

「指南 樂臺注鬼谷子曰：肅慎還，周公恐其迷路，造指南車送之。〔三國譙周〕古史考亦云周公作，或曰管仲作。〔晉〕崔豹古今注曰：舊說周公所作，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為司南之製。按黃帝內傳〔彬案：黃帝內傳係陰陽家著作，依托籙鏗（彭祖）得諸石室，宋史藝文志有著錄〕曰：玄女為帝製司南車當其前。志林〔彬案：晉陰陽家盧達所撰，書凡二十四卷，見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卷五〕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人皆惑，帝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古今注又曰：指南車起於黃帝戰蚩尤，「蚩尤」作大霧，迷四方，於是作指南車也。」

說指南車是周公時或管仲時所作，我不敢無理由地否認，也不敢無理由地是認；假如遠在商殷時代我國已有指南針的發明，那麼，說指南車是周公時或管仲時所作，也有可能。但說指南車是創始於黃帝，分明是陰陽家在那裡造謠，原來陰陽家一貫的作風，便是把很多人、事、物都托始於黃帝。我們從事物紀原（這部書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這段簡短記載看來，無論「黃帝說」也罷，「周公說」也罷，「管仲說」也罷，實際都是從陰陽家著作裡摘錄下來的，「指南車」的記錄為什麼全出自陰陽家，為什麼又要托始於黃帝，這便證明了指南車亦為陰陽家所製。

據陰陽家之說，除指南車外，還有一種車叫做記里車的（亦名大章車），也是黃帝所始制。古今注說大章車所以識道里，起於西京（西漢），但黃帝內傳又說玄女為帝製司南車當其前，記里車當其右。總之：凡人、事、物托始於黃帝的，大抵便是陰陽家的得意之作。記里車和司南車是有連帶關係的，陰陽家的學問是廣博的，他們登山涉水，心最誠，膽最大，因此定方位，識道里的工具便成爲他們的秘寶。

(二)從正史看「司南車」和「記里車」(「記里鼓車」)的形制，可先參考唐太宗撰的晉書。

據晉書志輿服云：
「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指南，大駕出行，爲先啓之乘。」

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
又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志輿服亦云：

「指南車四周廂上施屋，指南人衣裙襦天衣，在廂中，上四角皆施龍子于懸雜色真孔雀毼，烏布早複幔，漆畫輪駕午皆銅校飾。」

記里鼓車制如指南，上施華蓋子，縹(紺)衣漆畫，鼓機皆在內。」

我們便可發覺這兩種工具都具備陰陽家製作的特徵了。這木刻的「仙人」要穿天衣(羽衣)，這天衣(羽衣)便是陰陽家作品的標識。從其形制看來，也可看出指南車和指南針同樣，是發明於陰陽方術之士的。

二、指南針發明應在先，指南車的發明應在後

一般人所以有指南車發明在先，指南針發明在後的錯覺，實因陰陽家所作「指南車創始於黃帝」之說爲之作祟。我以爲按情理製針較易，製車較難，按地理中國人發現磁針的指極性較易，發明機械輪齒以製指南車當較難。這是指南針發明應先於指南車的理由之一。

1. 指南針指南車沿革簡史

若果我們追究到指南針和指南車的沿革史，便更可看出兩者發明的孰先孰後。原來關於磁石引針

的記錄早在先秦時代已屢登於陰陽家和接近陰陽家的學者的著作內。指南針在先秦時代早已發明是毫無疑問的。但反觀指南車發明的有無，則直至三國曹魏之時，學者之間還多所爭論。例如三國志魏書卷二九杜夔傳附註博士馬鈞事蹟，有云：

「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無益，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曹叡），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

馬鈞這偉大的人物在魏書內原無傳記，要直到劉宋裴駟纔依據魏略撮述其生平事蹟附註在一個音律家杜夔的傳記內。若無裴駟的一個附註，則這發明史也許便隨魏略的佚亡而湮沒。在馬鈞之前，中國已有指南車，從此可以看出。他如梁沈約所撰宋書志禮五云：

「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云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彬案：據三國志引魏略，應在明帝青龍三年即西二三五年）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晉亂復亡。」

可知指南車早有製作，但屢經失傳。在後漢時曾有張衡的再度創造，但漢末之亂又復不存。馬鈞更造的指南車是指南車的革命，是藉機械輪齒製成，但恐已非古制。據隋書志禮儀五云：

「指南車大駕出，爲先啓之乘，漢初置兪兒騎，並爲先驅。左太冲曰：『兪騎聘路，指南司方。』後廢其騎，而存其車。」

「記里車駕牛，其中有木人執槌、車行一里，則打一鎚。」

在宋王應麟的玉海內，有詳記漢代的指南車，梁沈約說「至於秦漢，其制無聞」，未免牽強。我們比

較研究指南針和指南車的史料，發覺在漢代以前，只有在陰陽學家或接近陰陽家的學者的著作內有少許關於「磁石引針」和「司南指極」的記錄（而且都是偶因論事引譬在無意中透露出來），在漢代以後，一面是指南車的記載陸續出現，一面磁針（指南針）的再不見有人提及；一直要晚到西曆十一世紀的趙宋時代（北宋和南宋）以後，纔又翻轉過來，把陰陽家用磁石磨針指南的秘密說出，而且自此以後，用機械來製指南車的記載又無新的發現了。中國人常把指南針和指南車混爲一談，原因在此；但指南車和指南針也不能過爲區別，最早的指南車大抵仍藉磁針在車內校對木人所指方向，直到後漢的張衡或曹魏的馬鈞以後，纔用機械輪齒來代替了磁針，我們也可由此看出。

我再放膽說一句：就是在馬鈞以後也罷，所謂指南車也還常用磁針配合人功來校正木人指向的。指南車的史料在中國能夠約略保存的原因，還不過因爲它對於輿服禮儀有了功用。中國人所注重的是禮儀，而不是技巧。關於指南車的沿革，可參考晉崔豹的古今注卷上輿服第一，唐太宗的晉書卷二十五輿服志，梁沈約的宋書卷十八禮志，梁蕭子顯的南齊書卷十七輿服志和卷五二文學傳祖冲之傳，唐長孫無忌等的隋書卷十禮儀志，後晉劉昫的舊唐書四十五輿服志，宋歐陽修新唐書卷二十三儀衛志和元脫脫等的宋史卷一四九輿服志等，而宋王應麟的玉海，宋高承的事物紀原，都因指南車和輿駕羽衛有關係而曾力加考證。此刻爲篇幅所限，未能詳引。至於近人關於指南針和指南車的著作，如王振鐸先生的司南指南針與羅盤針和李書華先生的指南針的起源，我以爲都各有所長，值得研讀。

中國人在已發明用機械輪齒來操縱指南車以後，還常照舊用磁針來校正木人指向的原因，由於機械輪齒的指南車車制屢經失傳，由於中國一般士人都只把這種工具看做只供輿駕羽衛之用。在馬鈞造車以後，到了晉亂車制又復亡失。五胡的石虎曾使解飛，姚興曾使令狐生更造，但成績不詳。到了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西四一七年），劉裕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其制有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大駕鹵簿，最先啓行。此車爲「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猶

須人功正之」(案：參攷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卷五十二祖冲之傳)，到了宋順帝昇明中(西四七七—四七八年)，蕭道成(齊太祖)輔政，再使祖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當時有北人索駟驎也說能造指南車，蕭道成使與祖冲之各造，命於樂遊苑相對比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老實說一句，機械學在中國是不容易發達的，社會環境便不許它發達，像祖冲之那般天才，他的出名並非由於指南車的製造，而是由於他曾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等，纔使得他被列入南齊書的文學傳內。像姚興的指南車，只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動木人的指向，便可看出那種指南車還是用磁針在車內隨時校對。

三、指南針指南車的航海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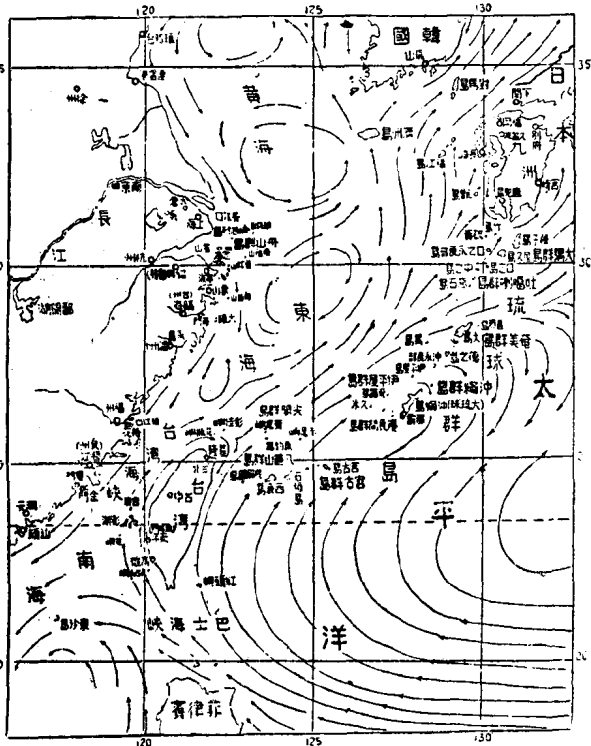
我以為陰陽方士所以要發明這種司方定位的工具，是因為他們對此有確實急切的需要。他們要用堪輿術來維持生活，他們要登山涉水以求仙煉藥，都要攜置一種司南的工具，他們爲了迎合君主的心理，爲了央求神仙的喜悅，纔再在磁針之外加上車的裝飾。有人要用所謂「默證法」來否認在北宋朱或萍洲可談內發現有關航海用針的記錄以前中國人會用磁針放海，我以為中國人會用磁針放海與否是一件事，有無記錄是另一件事，指南針或指南車都並非笨重之物，中國人在宋代以前，既會利用它在陸行方面，自然也會利用它在海行方面。須知著作有闕漏，文獻有佚亡，指南車只因和皇帝的輿駕有關，纔被各史寫入輿服志內或禮儀志內。改製指南車的馬鈞從現在看來是在歷史上有地位的人物，但魏書却並不把他提起。

1. 風帆航行和指南針指南車的關係

我們又應該知道，在風帆時代，航行最倚賴的是風，其次是濤，「凡往異域，順勢而行。」在涉

海途中，辨認方向的方法極多，大凡在原有的固定航線裡的海行，看日、看星、看山、看水、看風、看雲、看魚、看鳥，在慣於海行的「舟師」都可藉以看出船行的方向，在風濤皆順的場合尤其如此，指南針或指南車是在天地晦冥時始取出使用，所以直到清朝，有很多的風帆記錄都忽略了指南記載。宋代關於指南針的記載特多的原因是由於航線大關，新港增設，就中尤多逆流遠洋的新航線，而宋人又倚海船為國用，由於功利主義，指南針纜引起一般讀書人的注意。指南這個工具到了宋代纜公開製造販賣，（也許羅盤針是宋代以後纜有的，羅盤針也稱指南針，其實是指南針外再加上一個羅盤），纜和一般士人有了接觸。宋人的著作風氣又是有聞必錄的，再加上印刷的便利，一個廣州帥臣朱服的兒子朱彧，偶因好事，纜把指南針的航海使用故事筆錄下來，這是為什麼要遲到北宋纜容易看到有用指南針航海記錄的原因，但却不能視此以為中國人要直到北宋纜曉得用指南針來航海的事實的開始。

追究中國人在什麼時候開始會用指南針放海的歷史，我以為



圖流海作新年四三九一隆道田字·料資攷參流海黃海東圖本

最正當的方法，還是先追究陰陽家或接近陰陽家的學者的著作。

第一：讓我們先追究到山海經（這是我國登山入海的方士寫成的一部地理書），山海經裡有磁石和鐵的記載，這是可注意的第一點。山海經的目次首爲南山經，次爲西山經，次爲北山經，次爲東山經，次爲中山經，其海外諸經亦首南，次西，次北，次東，其海內諸經亦同。由此我們得到一種暗示，就是「司南」觀念的被重視和方士登山入海可能已有指南針的使用。

第二：據宋書卷十八禮志指南車條云：「晉代又有指南舟。」這種指南舟的記錄在現存的晉人著作裡面是查不出來的，要直到南朝梁沈約撰宋書，纔把它說上一句。晉代的指南舟是利用磁針來司方定位的呢？還是利用輪齒機械來指南的呢？史無明文。不過，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中國人曉得利用磁針應在先，曉得利用機械輪齒應在後，假如晉代的指南舟已曉得利用機械輪齒，則其前必已利用磁針。在北宋仁宗慶曆間（一〇四一—一〇四八）曾公亮等所撰成的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五裡有記：

「若遇天景噓霾，夜色暝黑，又不能辨方向，則當縱老馬前行，令識道路，或出指南車及指南魚，以辨方向。」

又北宋徽宗時朱彧所撰萍洲可談卷二有說：

「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

又清同治續修臺灣府志卷一附考引舊志云：

「船（自廈門）至臺灣入鹿耳門，行舟者皆以北極星爲準，黑夜無星可憑，則以指南車按定子午格，巽向（東南向）而行。」

實際上，無論指南針也罷，指南車也罷，指南魚也罷，都可水陸兩用的。「指南舟」、「指南魚」、「指南龜」等究竟是如何制作，也許還只有方家曉得，中國一般士人卻認此爲百工之末，不值詳記的。

2. 方士入海和指南針的發明和使用

第三：方士入海是要獨秘行踪的。儘管如此，他們從戰國到秦漢的積極入海記錄，還見於史記漢書。我以為日影之術星宿之學在我國早已發達，又以為正統之「陰陽學派」為我國學術之源，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蓋皆由此系分者。史記六家：首列陰陽，次儒、次墨、次名、次法、次道德，其所謂「陰陽家」，蓋指正統之陰陽家而言，我國古代設官，首重曆數之官，史記謂陰陽家出自羲和（曆數）之官，觀於殷周以前，我國之重卜筮，事鬼神，則知陰陽家之源最遠。我國此種學問發達之早，遂促成一種登山入海以追究天體終極之思想，其沿海居民，更受所謂「海市蜃樓」的引誘，而幻覺海之彼岸必有「神山」「仙山」之存在。左傳孟子記齊景公已有放海求仙的思想，論語記孔子亦欲乘桴浮於海而居九夷（東夷）。可見在春秋以前我國沿海居民的海洋慾已很旺盛。至於醉心神仙之方士，其登山涉水，心最誠，膽最大，而關於天文、曆數、方位之學亦最充贍，躬踐實行，以追求其絕世離俗之海外烏托邦（不死鄉）。他們西則求西王母於崑崙，東則求東王父於蓬萊，他們同有一種迷信，認為中原之氣不淨，煉藥求仙必須於遠隔中原之處得之。指南針（磁針）的發明是因為他們登山涉海有此需要。依據他們的學說，有如史記封禪書和漢書郊祀志所記：

「天下名山八，而五在中國，三在夷蠻。」所謂「三在夷蠻」的名山，便是所謂「海中三神山」；蓬萊、瀛洲、方丈。這是戰國秦漢時代方士追求海中名山異常急切，爭言之於君主，而君主亦莫不欲得而甘心的原因。原來方士們對於磁石，很早便加以種種利用。在管子、關尹子、鬼谷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春秋繁露、淮南子、論衡、前漢書藝文志、山海經、抱朴子等書內都有提及磁石和鐵的關係。在後人的傳說裡，更有說管仲與桓公利用司南遠涉流沙。但方士入海必曾用磁針的證據，我以為有下列各點：

(1) 磁石原來被方士們稱做五石之一。據晉葛洪撰抱朴子金丹篇云：